

革命生涯实录

□郑永晖

革命不是绣花，而是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友、我的斗争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就要求革命者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在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在秘密工作环境下，注意掩护，避免暴露受破坏；在战争环境中，讲求战略策略，注意团结群众，孤立敌人，壮大保存自己，最后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不仅是对革命者的很好的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一、参加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

1939年初，我入党后不久，中山县委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派我和肖志刚、肖伟华、黄友涯、廖铎5人，参加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该班共有50多名学员，都是东南特委属下各地派来的党员干部。当时学习的地点是在东江地区刚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惠阳县坪山镇农村的一家比较宽敞的民房楼上。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学习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学习班上，我们经常见到的东南特委的领导同志有梁广、韩凯亚、温卓华、杨康华等。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党的组织建设知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等。

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革命思想的第一次飞跃。首先是从理论上较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组织，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其次认识到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第三，对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对我在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住考验，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二、在抗日群众运动中经受考验

我从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结业回到中山以后，正是中山县抗日群众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时期。

1938—1939年底，日军已侵占了广州等地，企图入侵中山，如两次横门登陆和汽艇骚扰八区斗门和五区古宥等地，因此中山抗日群众运动达到高潮。但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反共高潮，中山县国民党党部书记林卓夫以及中山县警备司令部吴康楠等人，对中山抗日群众团体进行镇压，宣布解散中山抗日妇女协会和中山青年抗日先锋队。在这期间，由于党组织的不断扩大发展，五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有了很大的变动，五区区委书记郑仲光调中山县委工作，由廖铎接任以后由黄君约接任，不久黄君约又调到了九区工作，由张诚美接任区委书记，郑少康任区委组织委员，我从党支部书记提升为区委宣传委员，并接任青年抗日先锋队区队副张诚美的职务，因此我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但当时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虽然有肺病，仍坚持工作。在此期间我记得曾带领三四十名抗先队的武装队伍，开赴古宥乡的山头，监视日军汽艇，准备挫败其在古宥乡登陆的图谋。在日军撤离后，受到抗先队队长孙子静（当时的国民党五区区长）的慰问和赞扬。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林卓夫解散县妇女协会和抗先队的行径斗争的同时，我们坚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仍用抗先队名义演出抗日话剧，与国民党当地派出所郭警长进行斗争。在国民党五区党部召开宣布解散县妇女协会和抗先队的会议上，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活动。直至1940年3月，日军占领中山县，根据党的指示我们才撤出三乡平原地区，进入五桂山区社贝乡和田心空鸦村掩蔽活动。

在日军进驻雍陌乡，三乡已建立伪政权后，我和郑少康组织原三乡抗先队的武装，对雍

陌乡的日军和伪联防队，进行武装袭击、骚扰并破坏了公路。

三、从公开的群众运动，转入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由于日军全面占领了中山，并建立整套县区乡的伪政权，加强对中山的统治，中山县的整个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我们的公开活动，后来组织派遣我于 1940 年夏从五区撤到四区山区的白企、贝头里村任小学教师，做一般的宣传工作。

1940 年 8 月，为了做好掩护工作，经组织批准，我与郭妙莲结婚，一起在贝头里村生活。我与郭妙莲的结合，一方面是双方母亲之命、媒妁之言，另一方面也是双方的自由恋爱。我们的结合是经过双方母亲的安排，并经刘帼超医生介绍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工作在一起，并在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感情来。开始我的思想还有顾虑，觉得郭妙莲因家乡（中山县九区阜沙）遭受水灾和风灾，倾家荡产，被迫给平岚乡郑三婆当婢女，社会地位低微，会影响自己声誉。但参党后由于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社会地位低微的婢女，是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应该感到光荣，不应作为思想负担，因此改变了过去的错误观念，才决定把这门婚事定下来，并介绍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环境，工作比较紧张，也没有考虑过结婚问题。到了山区，学校教师生活比较安定，结婚也有利于掩护工作。因此我向组织提出这个意见，组织很快就批准我的请求。

1940 年底，我被调至四区沙边乡校任教，并负责领导该乡的党员教师和矿山工人党员工作，直接受中山县委宣传部长黄峰单线领导。郭妙莲同时调到四区平原的畔沙乡与孙创等同志负责交通站的工作。

1941 年夏，我又被调到中山二区任特派员，负责溪角乡、庞头乡交通站和地方党员的单线领导工作。为了找寻职业来掩护工作和解决生活问题，曾作过很多尝试，做过上街叫卖水果的生意和街边的摊档小贩，但都难于解决经济收入问题，并且不利于进行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沿街叫卖抽油（即酱油），能维持生活，而且只在早晚的时间做买卖，既有利于接近群众，了解他们的情绪，也利于做宣传和开展党的工作，因此决定做起沿街叫卖抽油的买卖。我由一位教师，变成了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确在生活和感情上，都起了 180 度的转变，思想上是有着斗争的。但是考虑到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党的革命事业，为做好以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也就乐于去做这些工作。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仍然困扰我，以致在开始叫卖抽油第一声，走了一段路程方有勇气叫卖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与庞头乡、白石乡等几条乡村的沿街顾客，混得比较熟了，有些顾客一时拿不出钱来，我就赊给他等下回再收钱，顾客就这样对我产生了好感。我原来住在溪角乡，是乡党员刘××通过组织关系为我找的住处，因为该住处地方比较小，又当街，不利于掩护工作，想找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因此我在庞头乡到处打听，是否有闲屋出租。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我这里有一间比较大的闲屋，很久没有人住了，价钱也便宜，不知你敢不敢去住。”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间屋 10 多年前就建好，是我的堂兄弟一家人住的，住了几年全家都死绝了，据说是屋的风水不好，有时还会闹鬼呢，他们一家人死绝后，我就为他们管屋，锁匙还在我这里，如果你想租，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屋就在这里附近。”我听了她的介绍后，感到很合适，至于风水好坏和闹鬼，这是封建迷信问题，我是无神论者，当然是不会信邪的。我就对她说：“请你带我去看。”她拿了锁匙，把大门开开，因为很久没有人住过，开门后果然有一股阴森森的空气扑来。进去一看，只见厅堂有 20 平方米左右，厅堂后有神龛，神龛后有 15 平方米的住房，住房内还有阁楼可住一二人。左边还有比较宽大的厨房，而且炉灶俱全，厨房还有后门，可以通到后面的街上。我看了感到很合适，马上答应她并交了定金，过两天就搬过来住。我马上告诉溪角乡的党员刘××并报告组织，组织很快就批准了。

我在庞头乡住下后，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生意也越做越好，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

活，而且还能养起往来的交通员。在我找到比较合适的住处后，组织上为了安置好女交通员的工作，也为我的工作作掩护，曾派郑志德和我住在一起，她住在阁楼上，对外假称夫妻，对内是上下级关系。郑志德是三乡桥头乡人，过去是比较熟悉的。我考虑到我是共产党员，是有妇之夫，又跟她也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始终保持同志的关系，没有出现越轨行为，受到组织和郑志德的赞扬。这段时间不长，只有两三个月，但也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

我当时的的工作，除了做党的交通站和联系党员外，还负责了解敌、友、我各方面的情报工作。我在做小贩生活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群众，并通过群众了解到许多民间疾苦和各方消息。

我还利用捎挑小贩职业之便，利用前往石岐公信酱油店购买抽油的机会，把货物购妥后，便外出与上级领导的党员联系工作。如到长洲乡党员黄社雄家里，传达组织决定和有关指示，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因黄社雄是长洲乡一个地方灰色武装中队的主要负责人，他家里是个大家族，生活比较阔绰，家里设施也比较辉煌，如果我的穿着不像样，仍穿着挑卖抽油的衣服，就很不相称。因此还要在附近靠池塘边的公共厕所里，换上一套像样的时装，才敢进他的家门，以掩人耳目。

大约在 1942 年初，党组织为了开展沙田区工作，又派我到二区横栏乡沙田藕围村工作。组织考虑到我的工作需要掩护，也考虑我与爱人长期分居，决定把我爱人调在一起工作。为了以职业掩护我的工作，我们通过当地党和群众的关系，租了一间草房，开设一间商店，由郭妙莲看铺，做生活杂货的小生意。考虑到门市生意有限，收入不多，决定还是采用捎挑上街办法，才能解决生活问题。但是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沙田地区群众生活必需生油、火水（即煤油）销路较好，因此决定改变为卖生油、火水，不做酱油佬了。当时组织还派了党员林文亮和他的小弟弟林文光，随我到横栏工作。林文亮靠每天理发维持生活，兼做交通员工作。他的小弟弟随着我一起生活。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通过捎挑上街卖生油、火水跑遍了横栏各基围，生意也越做越兴旺，不仅能养活过往交通员，而且还有了积蓄，交通站的工作任务，也完成得比较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但由于地处偏僻，没有接生医护人员，小孩呱呱落地后，又不会护理，可怜一个白胖胖的男孩，生下不到半天就夭折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下达命令，把我从地方党调到武装部队去工作。

为了执行党比较紧迫的任务，我安排好工作和爱人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征途。

四、从地下党工作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

1943 年初，经过中山县委宣传部长黄峰的介绍，交通员把我带到五桂山区石门乡，谢立全（当时的陈副官）接见我，经过简单的介绍后，要求我等待接受任务。当天下午，谭桂明和我谈话并交待我的任务：回中山五区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开展五区的武装斗争工作。并派人带我到五区的凤凰山东坑村，负责游击部队的领导工作。该部队为一小队编制，小队副队长叫刘文辉，班长有谭北师、郑华胜、唐森等人，队员 30 余人。枪支全是七九步枪，装备比较落后，但队员情绪比较好。谭北师和郑华胜以前都是三乡的抗先队员，我比较熟悉。熟悉情况后，我便开始进行我的工作。

我拿着谭桂明给我的亲笔信与谭北师两人去见国民党游击司令部驻南溪乡的大队长钟汉明，并把我们的情况和他说了，要求他给我们番号回三乡一带活动。他表面热情接待，但听说我要用他的番号回三乡一带活动后，却说要考虑考虑。经过数次找他，仍是没有正面拒绝，而是采取拖延的办法。我把情况向谭桂明汇报后，谭桂明认为，不能长久拖下去，决定另找别的门路。谭桂明后来又写信给我到八区去见我们部队陈中坚大队长，叫他写介绍信给我去见民利公司的头头吴金。我和谭北师通过各种办法见到吴金，说明来意后，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却叫我们到申堂乡，去找他的属下曾添裕大队长。曾添裕比较爽快，说不

能给民利公司番号，只给当地联防自卫队的番号，同意我们在申堂乡宝鸭山村等地驻防。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同意我们在申堂乡一带驻防，却符合我们的心愿。因为宝鸭山村，过了佛仔运山头，下山到南龙村，不远就是三乡的平岚村了，这有利于我们回三乡进行武装活动。经过谭桂明批准，我们便把在凤凰山东坑村的部队，拉进申堂乡宝鸭山村的民房碉楼里。我们在开展部队改造训练的同时，对当地群众也迅速开展抗战救国宣传教育和减租减息工作，得到群众的同情拥护，为以后开展游击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利用回平岚家乡之便，与过去的党员郑文滔和其他青年抗日先锋队员联系，教育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抗战，振奋精神，而且通过他们，了解平岚乡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驻防部队及其装备等情况。又恢复郑文滔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派他利用他哥郑文培在郑东镇部队工作的关系，打进郑东镇在三乡的伪联防队，了解郑东镇内部的装备布防等情况，向谭桂明报告。这对以后配合主力部队活捉郑东镇，消灭他们的部队，起到很好作用。

我们的主力部队在 1943 年 5 月间活捉了郑东镇后，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便控制三乡政权，决定成立五区独立中队，将原驻申堂乡宝鸭山村的部队核编为独立中队。中队长为郑兴（后叛变），中队副为郑吉，中队指导员为郑永晖。为了适应当时还不能完全在军事上控制三乡，但政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需要，我们采取过渡形式，建立三乡联乡办事处灰色的政权组织，由原来平岚、乌石、桥头 3 个乡村派出乡长组成。并推选郑永晖任联乡办事处主任，负责三乡一带的政务和推动各乡的民主建设工作。

在这期间，欧初还交代我一项任务，去做澳门的统战工作。据欧初介绍，驻山区贝头里村的部队，扣留了到该村传教的澳门葡籍教会的安神父。因为在战争年月里，到山区来有嫌疑，经查无实据，更重要的是澳门敌、伪、顽的矛盾很多，日军又有侵占澳门的企图，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澳门为我所用，这是非常有利的。在审查安神父过程中，了解到他与三乡的刘帼超医生是教友，与她经常往来，而刘帼超医生又与我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决定派我护送安神父回澳门，并通过他去做澳门当局的统战工作。我带着安神父回到三乡，把上级的指示转达给刘帼超医生，希望她多做安神父的思想工作。经过刘帼超做安神父的工作，安神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传递工作。我们到澳门后把欧初的亲笔信交安神父转澳督，第二天他们便派澳门警察头子慕拉士与我见面，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说明来意，表明我们的态度。他除了表示感谢外，答应按欧初信中的建议，加强与我们的联系。当时虽没有很大收获，但事后不久，他们便派人与我们东坑的部队联系上，以后更为我们解决了电台、枪支、弹药、医疗器械药品等，解决了我们许多实际的困难。

三乡联乡办事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并乘我军在前山、翠微、神湾、三溪等歼灭顽军的有利形势，于 1944 年 10 月，召开了已建立民主乡政权的各乡代表会议。当时参加的乡村有平岚、乌石、桥头、平湖、沙岗、大布、鸦岗、南龙、南坑、白石等。会议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郑永晖为谷镇区政权筹备委员会主任，郑文、郑济民为财经委员，马华谭为民政委员，郑迪伟为妇女委员，周进为武装委员，李远帆为民教委员，孙一之为秘书长。

谷镇区筹委会成立后，立即紧张地进行各项工作。首先，协助各乡进行民主选举工作，选出新一套民主乡政权人员，以便正式成立谷镇区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区政权武装集结队和各乡镇民兵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镇压汉奸和反动分子，并选派古池和林开担任区集结队副队长。第三，协助主力部队扩充新兵源，建立健全粮站、税站、医疗站。第四，救济贫民，排解民事纠纷，禁烟禁赌，并将原桂山高小学校改办为桂山中学，同时恢复各乡已停办的小学，兴办新的小学。第五，做好乡村的统战工作，团结开明士绅，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

在这期间，司令部发现郑兴的腐败行为，撤销了其雪花队中队长的职务。在我们歼灭了三乡伪联防大队，活捉郑东镇大队长后，为了把郑东镇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交回抗日部队作军需，曾派郑兴向郑东镇家属催要款项，不料郑兴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在郑东镇家属

的引诱下，腐化堕落，竟住食淫乐在她家里，不以为耻。与郑东镇未被消灭的打手，同流合污欺诈群众，造成极坏影响。后经司令部林锵云亲下手令，命霍文中队长前来找我和郑吉商量如何逮捕郑兴回司令部处理。我和郑吉约郑兴来开会，把林锵云手令交他看后，马上缴了他的手枪，由霍文把他押回槟榔山司令部批判教育，看管起来（后来在司令部挺进中区时，在海洲乘管理人员管理不严，叛逃到国民党反动派萧天祥部队，成了叛徒）。司令部根据雪花队情况，决定任命郑杏为中队长，以后又从中山二区部队，调周增源（即周进）为中队副，中队指导员仍为郑永晖，并从主力部队调谭光耀任小队长。以后又扩大编制，从40多人增至60余人，充实装备，增加机关枪和步枪，并加强部队的领导工作。

谷镇区筹委会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深得群众的拥护爱戴，也得到上级的赞扬。到1945年3月，成立谷镇区民主区政权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经请示县督导处批准后，决定于3月中旬，召开谷镇区民选各乡代表大会，由各乡民选乡长参加。参加会议的各乡代表，除原来参加筹委会议的各乡代表外，又扩大了许多新的乡村，如雍陌乡、里埔乡、外埔乡、西山乡、萧家村、塘乡、申堂乡、古宥乡、神湾乡、三溪乡、麻子乡等。在大会期间，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亲临指导。他除了肯定筹委会工作的成绩之外，还提出今后工作的方向，会议开得热烈认真。在开始选举投票时，阮洪川代表督导处提出：郑永晖因工作需要，调县督导处工作，他不参与这次选举了，请大家另选其他。因此，选举结果除由郑吉接替我的职务外，其他委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在选举前阮洪川找我谈话。他说根据上级党委和林叔的意见，调你上督导处负责民兵武装工作，征求你的意见。我当时心里实在是舍不得离开工作多年的家乡，认为自己工作有成绩，工作比较顺利，而且孩子郑建国生下来不久，担心爱人没人照顾，但是想到党组织已作出决定，工作确实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是党员的天职，于是交代好了工作，告别亲人，又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五、接受统战工作任务

在我接受新的工作前，阮洪川还交代我先去接受欧初的工作任务，因此我直接到欧初那里去报到。见到欧初，寒暄几句后，欧初笑着说：“又要你去搞统战工作。这次是去做‘大天二’民利公司的头子梁自带、吴金、潘惠等人的工作。随同去的有凌子云、甘保芳等人。你代表支队部和督导处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情抗战和互相支持，同时把我们缴获的10个掷弹筒炮弹送给他们，宣传我们粉碎敌伪‘十路围攻’取得的胜利，也把山区群众遭受敌人抢掠烧杀的惨状和苦难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给予同情和经济的捐助。”我接受任务后，便与凌子云、甘保芳商量，决定工作具体步骤便整装出发。按计划我们出了山区，便从水路乘坐小艇，直到九区阜沙圩，去找梁伯雄，把欧初的意见向他传达，并通过他们派人带我们去见梁自带等人。

这次还算凑巧，梁自带、吴金、潘惠等民利公司的头子都在浮圩。见面后，我们把欧初的亲笔信交给他们，并把来意说明，将10枚掷弹筒炮弹赠送给他们，他们表面上表示欢迎和热情接待，梁自带还解囊相助当时国民党政府的5000元给我们。但从他们的言表来看，他们对我们的这次行动，还是比较警惕的。

我从九区回来向欧初汇报，他除肯定我们的工作成绩外，又交代我一个新的任务：叫我到五桂山区周边的石鼓挾乡，去做民利公司属下大胆雄大队长下面的一位中队长的统战工作。这名中队长是一位年轻有为、思想比较进步的中青年人，我和他的接洽过程中，说话很投机。我把我们的意图说明后，他表示非常赞成我们的看法，认为当前国内投降分裂的危机是十分严重的，赞成我们反对投降分裂的主张和采取的措施，表示同意和我们加强联系，互相支援。当天晚上他留我在他家食宿并谈到深夜，第二天早上早餐后，他还送我一程路，再三表示愿意今后互相支援。

六、在“五九”大“扫荡”中，坚持山区掩蔽斗争

我完成这次任务回来向欧初汇报后，便回到督导处，接任民兵武装工作。我清楚记得，接任民兵武装工作后，只到过四区的小隐崖口等乡检查工作。不久敌、伪、顽便开始对我们进行“五九”大“扫荡”，我们督导处的几位领导，包括曾谷、张为以及五桂山区政权的凌子云、甘保芳等人，在合水口和石门九堡等地与敌人周旋，后来形势越来越严重，敌人开始进驻部分山区，我被派到长江乡横兰村和破获村工作。当时在横兰村掩护的有黄彩娥、穆老师夫妇及其小孩等人，在破获村掩护的有大斑胜（许胜）、金星等。我在长江乡工作的任务，是与长江乡乡长龙焕榕联系，做“反扫荡”的群众工作。

我们掩蔽在这条深山沟的横兰小村子里，白天出去附近村庄活动，夜里也不敢睡在村子里，而是睡在村外路旁的树林中，以防敌人的夜袭。有一天早上4点多钟，敌人的马队果然经过横兰村，马蹄声听得非常清楚，好在敌人没有进村搜索，我们又在村外树林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只是虚惊一场。当时的敌情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下来，安定群众情绪，并通过与乡长加强联系，了解敌情，经常向县督导处报告情况。

当时由于通讯工具缺乏，只靠交通员传递信息，知道敌人联合向山区进攻“扫荡”，并进驻石莹桥乡等地，平原地区的主要乡村如五区三乡等，都以为被敌人占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不少为敌人逮捕和杀害，但具体情况都不是很清楚。对我的爱人郭妙莲的情况，也无法弄清。

我在长江乡掩蔽下来，开展群众工作，一直坚持到1945年7月间，才接交通员黄华旭带来上级的通知，与许胜、郑吉、冯兰等人，撤离山区。经过澳门交通站和香港交通站，转到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宝安县盐田乡与撤到东江来的中山部队会师，并参加部队的干部整风班学习。因战争环境，整风学习时间不长，但是对延安整风精神，有了初步了解，为以后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久在准备挺进粤赣湘边开展新的游击根据地，与王震将军会师的行军途中，接到上级通知说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停止了与王震将军会师的计划。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就在这个高兴的日子里，接上级通知，先撤回香港，等待时机回中山县开展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

七、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的活动

我随同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滨海区民主政权主任吴子仁、五桂山区区政权妇女委员谢月珍等数位同志回到香港后，根据当时情况，上级决定各找各的亲戚朋友暂时栖身。我姐姐郑胜（后改名为郑妙英）住在香港深水埗，我记得从中山县经过澳门撤到东江经过香港时，曾偶然在街上遇见了她，并去过她的家里。那时香港还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下，他们一家三口，穷困至极，姐夫曾是非常壮健的人，但因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百业衰弱，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捱饥抵饿，营养不良，又患疟疾，周身浮肿，十分可怜，但住的地方还可以，所以我决定回到她那里暂时安身。但这次回到她家时，日本侵略者已投降，英国政府正在接收香港，救济居民。我见到姐姐时，她的丈夫不幸于上月已经去世，她母子相依为命，靠英政府发救济粮度日，生活十分困难。但我只能在她家住下，把组织交给我的一些盘缠，交给她作维持生活之用。不久阮洪川安排我到一间洋行的4楼一间很阔气的房间，这里作为饶彰枫与香港市委和民主人士接头开会的地方，每月经费，包括房租和膳食由饶彰枫支付，生活也比较清闲，但好景不长，大约经过两个月后该地点撤销了，组织决定让我仍回到姐姐处，自谋生计，等候安排工作，并指示凡撤到香港来的都要按“投亲靠友，自谋生活，坚持下来，开展工作”的方针。为了立足香港，解决生活问题，凭着过去的经验，我又去学做街边小贩

的生意，但城市生活不同于乡村，小贩生意难做，难以维持生计。以后得到郑三婆的资助，筹来 500 元港币，这在当时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但如何发挥这笔钱的作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后来与郑文商量拟参加他们开业的茶居，他们也满口答应，认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但投资后不到几天，他们便宣布停业，把我非常难得的 500 元港币抵债，收不回来，以致我的生活发生困难。在生活无着，也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看到我姐同房的小贩，做当时香港政府配给市民的大米生意的买卖，一买一卖颇赚钱，想向他学做这门生意，他也答应帮忙。但他说要做这门生意不容易，要参加他们的小贩工会，才能站得住脚，否则会被别人踢档的。我征求过我姐姐的意见，她也认为没有问题。我为了解决生活，坚持工作，不惜花了一笔钱（约当时的 30 港币），参加了他们的小贩工会。参加工会那天，我姐姐同房的小贩，带着我去见他们的头头。寒暄几句后，他表示同意接收我为会员，但他要我举行入会仪式。当时我以为是一般的仪式，也就答应了。入会仪式开始时，才知道要叩拜关帝，刺指为盟，我当时感到有些不妥，但钱已花了，也不好推辞，只好照着他的办。事后不久接到上级通知，要北撤山东烟台，又忙于交接工作任务，也就没有做买卖大米的生意了。

八、北撤山东烟台深受教育

我接到北撤通知，是通知我个人去的，不知道还可以带家眷。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便只身跟交通员和谢月珍等数人到宝安县沙鱼涌的部队报到。到沙鱼涌部队报到后，看到不少人都带着家眷同去，考虑到郭妙莲是党员干部，我们结婚后，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留下爱人在香港生活有困难，而且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想念及此，鼓起勇气向组织提出请求。组织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后，经批准我再回到香港与爱人商量，于 1946 年 6 月底，一同北撤山东烟台。

我们长期盼望抗战胜利，终于盼到了，但没有想到国民党又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们调集大量的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进攻我们的解放区，企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占领我们的解放区。经过我们部队的坚决还击，他们损失惨重，后来又改变策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中央为了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做出种种退让，其中包括答应把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到北方的解放区来。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只承认东江纵队，不承认其他纵队，包括我们的珠江纵队、中区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纵队、海南纵队等。为什么国民党只承认我们的东江纵队呢？原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沦陷区，东江纵队深入到港九地区活动，并与英美同盟军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东江纵队的存在。党考虑到党内是统一的，各个纵队的干部和士兵，都可以用东江纵队的名义，撤到北方去。我们就是这样以东江纵队的名义撤到山东烟台解放区去的。1946 年 6 月 30 日，美国的 4 艘登陆艇载着我们的干部和士兵以及家属 2500 多人，从宝安县的沙鱼涌出发，经过 5 天 5 夜的水路行程，于 1946 年 7 月 5 日到达烟台。

在美国的登陆艇上，我正好与林锵云司令员同船，因此接近他的机会比较多。他那种慈父式的面孔和谆谆善诱的教导，我至今仍在脑际念念不忘。我们的船，到了太平洋高浪区，风浪越来越大，晕浪的人越来越多，我也逐渐支持不住了。但过了高浪区后，晕浪逐渐消失，以后也就比较适应了。

到达烟台时的情景，十分动人。烟台市前来迎接我们部队的，有胶东地区、军区和烟台市党政军领导和群众万余人。当时军乐民笛高奏，锣鼓鞭炮掌声齐鸣，口号声响彻天际。解放区的老百姓，从码头到市区排着望不尽的长龙，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他们送茶送水，手里拿着鸡蛋、苹果、花生等硬塞进我们的腰包，那种热烈的气氛，我们从未见过，真是感动万分！他们看到我们不少战士赤着脚，不少女战士还挑着炊事工具在行进，也非常感动。认为广东游击战士艰苦战斗，背井离乡到北方来，甚为敬佩，他们呼喊着“向广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东江纵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到了烟台市芝水

区农村的驻地，分配给我们住的房子，是新婚不久的新娘房，使我们十分感动。群众的热情接待，说明当地群众工作做得非常到家，也使我们非常羡慕，都表示要向他们的党政军学习。

我们撤退到北方去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当地活动比较公开的人物。把我们这批干部撤到北方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干部免遭国民党的杀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以便为将来解放广东开展工作。党是把我们当做宝贵的财富来看待的。当时我们这批干部编成干部连，我被编在干部连的第三连，连长是穆怀，班长是何子成。

我们7月5日到了烟台市后，烟台市党政军召开盛大的欢迎我们部队胜利到达烟台市的联欢会，同时也是纪念“七一”党的生日纪念会。联欢会的热烈气氛使人久久难忘。我还记得我们部队到了烟台不久，国民党已向我们新四军的解放区开始进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了。党中央选择这个良好的时机，使我们平安地撤到北方来，免遭国民党在船上中途暗算，这是十分有远见的。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2期）

中山党史